

太原织毯 盛唐名产

夏文华



唐代韩休墓壁画《乐舞图》中的地毯（资料图片）

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)，38岁的白居易任职左拾遗，执掌讽谏建言之职，官阶虽然不高，地位却很重要，负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职责。是年，白居易开始创作大型组诗《新乐府》，以讽喻诗针砭官场积弊、体恤民生疾苦。全套诗作共50首，其第29首即为讽谏名篇《红线毯》。写这首诗，主要是为了反对“进奉”制度，诗前的小序直接点明了核心议题：“忧蚕桑之费也。”直指唐代地方向朝廷进贡珍稀织物的“进奉”弊政，借织物奢靡耗费，控诉劳民伤财的社会乱象。

《红线毯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太原毯涩毳缕硬，蜀都褥薄锦花冷，不如此毯温且柔。”从中可清楚看出：在唐代太原能制“毳缕硬”的羊毛毯。毳，指鸟兽的细毛。《汉书·晁错传》载：“鸟兽毳毛，其性能寒……毛毯是用羊毛线绩成，故曰‘毳缕’。”这是用当时两种极富盛名的纺织品来和红线毯进行对比：太原所织的毳毯质地太硬，成都所织的锦花毯质地太薄，都不及宣州红线毯的质地厚实。红线毯，指红色丝绒织成的地毯，在唐代是宣州土产的特殊贡品。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曰：“盖毯本以毛织成，而红线毯乃以丝为之，是兼太原毳缕毯与成都锦花褥之长，而无其短，殆同于今之所谓丝绒者。其工艺之精进可知矣。”宣州红线毯追求奢华的“温且柔”，而太原毯追求保暖耐用的“涩且硬”。白居易将太原产的毛毯与蜀锦、宣州丝绒并列，虽以“涩”和“硬”形容其质感，实则凸显了太原毯厚实、保暖、耐用的北方特色。这是唐代太原毛纺织工艺达

到极高水平的直接证据。

隋唐时期的纺织业规模日益扩大，纺织业主要分为丝织业、麻织业、毛织业和棉织业。当时地毯已经相当盛行，李肇《国史补》说：天下通用的物品，多得不可计数，如丝布作衣，麻布作囊，氍作盖，革作带，内邱白瓷甌，端溪紫石砚，天下人都通用。其中的“氍”即毡毯，可见当时地毯在唐代已很盛行。当时记载皇帝御驾帐内必须“施氍席”，将军出征的军帐内，要有“暖屋绣帘红地炉，织成壁衣红氍毹”，氍毹、氍毹都是羊毛织成的毯子。

地毯是纺织业重要的品类之一，在当时有很多地方都能编织地毯，所以，政府还设立了“毯坊使”“毡坊使”专门负责管理地毯的生产。五代时，曾将这两个机构合并，称为“毡毯使”。这是地毯业发展中首次以政府官方直接参与管理、经营，也是地毯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铭记。

为什么偏偏是太原盛产羊毛毯？结合史料来看，“太原毯”之所以能成为名产，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。

一是物产与技术的优势。太原地处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，既产羊毛又有先进的纺织技术，属于“天选之地”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河中府和汾州的土贡条目中都有“毡”的记录，《续资治通鉴》载：“代北苦寒，人多服毡罽（一种兽毛织品）。”这些记载说明，当时毛织品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御寒物资，市场需求极大。汾州、代州的位置在太原府周边，一南一北，可推知太原应当有很好的生产地毯的基础。王仲荦先生认为：有唐一代，畜牧业

敕勒川，阴山下。
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
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这首雄浑苍劲的北朝民歌几乎家喻户晓，可鲜少有人知道，他的传唱者、敕勒名将斛律金，居然与晋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北魏末年，朝政大权逐渐被权臣高欢掌控，原本统一的北方分裂成为东魏与西魏，晋阳（今太原）成为东魏实际的军政中心。公元546年，高欢亲率十万大军从晋阳出征，攻打西魏玉壁城（今运城稷山县）。这场战事异常惨烈，最终高欢以伤亡7万将士而惨败。与此同时，军中谣传主帅高欢中箭身亡，导致军心涣散。

病重的高欢强撑病体，设宴召见朝中文武重臣，为安定军心、慰藉塞外游牧将士的思乡之情，他特意命麾下老将斛律金当庭高歌。

斛律金虽不通文墨，却有着草原民族的赤诚豪迈，他起身挺立，拔剑击节，放开歌喉，将刻在血脉里的草原故乡，化作气势雄浑的歌声。歌声苍凉壮阔，质朴无华，道尽了敕勒草原的辽阔壮美和塞外将士的思乡深情。满座将士听闻故土乡音，无不悄然泪下，高欢也伴着歌声，轻声应和。一曲《敕勒歌》，安定了军心，鼓舞了士气，虽没让东魏将士在战中逆境翻盘，却让这首草原牧歌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回响。

玉壁之战后不到两个月，高欢就去世了。高洋篡夺东魏皇权，登基称帝，史称文宣帝，他建立北齐，定都晋阳，追封高欢为北齐神武帝。

北齐立国之后，高洋下令翻修扩建晋祠，一时间，晋祠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泉池碧水澄澈清幽，难老泉亭、善利泉亭、望川亭、读书台等建筑相继落成。唐代李吉甫所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援引南北朝学者姚最《序行记》明确记载：“高洋天保中，大起楼观，穿凿池塘，自洋以下皆游集焉，至今为北都之胜。”晋祠一跃成为北齐皇家游览祭祀、休憩宴饮的山水园林，也是晋阳别都最负盛名的名园胜迹。

据《斛律丞相传》记载：“北齐斛律金，字阿六敦，朔州敕勒部人。家晋阳，爱山水，常游晋祠。”天保年间，高洋时常亲临晋祠，登山临水、览胜抒怀，作为北齐开国丞相、朝中柱石之臣的斛律金，也常常伴驾游园。不仅如此，斛律金还在晋祠东南的王郭村修筑别墅。

北齐天统三年(567)，80岁的斛律金辞世。历代多部地方志均记载，这位老将最终葬于晋祠南五里晋王岭以东。明、清《太原县志》以及近代《晋祠志》也都沿袭此说，认定晋王岭上的古家便是斛律金之墓。当地百姓口口相传，将此处古墓称作“斛律丞相墓”。直至1979年，文物部门对王郭村古墓开展考古发掘，通过出土墓志最终证实，这座规模宏大、壁画精美的墓窟，主人实为北齐东安王娄叡。流传数百年的说法，终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

纵然墓葬身份被考古史实更正，却丝毫不减世人对这位名将的感念。一首《敕勒歌》、一段山水缘，让沙场豪情、故土乡愁，伴着千年祠宇代代流传。



微观晋祠（3）

晋商的家书

张稳柱

在明清五百年晋商闯荡天下的历程里，散落万里商途的家书，远比银幕故事更加厚重动人。晋商创下货通天下、汇通天下的商业传奇，足迹跨越山河远至海外，一纸家书是他们漂泊岁月里唯一的慰藉，更是完整留存下晋商商路征程与家国亲情交织的历史，让我们得以读懂辉煌商业背后柔软的人心。

晋商崛起于明初，兴盛于明清两代500余年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辐射范围最广的商帮群体。明初边关贸易开放，山西地处南北枢区，无数农家子弟告别黄土高原故土，踏上漫漫商路，从最初贩运粮油、布匹、茶叶等日用货物起步，沿着草原商路、万里茶道不断向外拓展。他们翻越太行山，穿行戈壁荒漠，南下湖广、闽浙，北上蒙古、俄罗斯，夏顶烈日，冬冒风雪，在盗匪、艰险路况的重重阻碍下，搭建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网络，实现了货通天下的宏伟格局。

晚清，晋商开启汇通天下的时代。鼎盛时期，山西各大票号在全国设立六百余家分号，业务延伸至汉口、长沙、广州，远达恰克图、莫斯科等地，几乎垄断晚清全国银两汇兑业务，商铺遍布国内所有商埠重镇，湖广地区作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，成为晋商南方经营的核心区域，湖南临湘羊楼司一带，更是晋商经营砖茶的重要据点，大批山西榆次、祁县商人常年客居于此，数十年不得归乡。

万里商路成就了晋商富甲天下的声名，却也带来了长久的别离。一代代晋商少年离家，数年甚至数十年驻守外地商号，家族团聚成为奢望。票号可以汇兑万千银两，却无法缩短相隔千里的距离，货物能够通达四海，唯有思念只能托付笔墨，这便是晋商家书诞生的时代背景。民间流传“出了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，鸿雁盼来家，家书抵万金”，道尽了千万晋商漂泊异乡的心境。

家书不同于普通文人的诗词和尺牍，它兼具商业记录与亲情倾诉双重属性，薄薄几张宣纸，写尽经商艰辛、家族叮嘱、故土牵挂三重内容，是晋商精神最真实的载体。

对在外 的晋商来说，家书首先是一份报平安的文书。商途凶险，时局动荡，土匪劫掠、战乱频发时常发生，每一封寄出的信件，都是给远方家人一颗定心丸。不少家书详细记述商号遭遇的危机：土匪抢掠街市、时局动乱商铺停业、路途受阻货物滞留，先言险境，再报平安，叮嘱家人不必担忧，字里行间藏着独自扛下苦难的坚韧。其次，家书也是晋商的经商手记，信中记录各地物价行情、银两汇兑费率、商号经营盈亏、分号往来账务，票号掌柜通过家书向山西总号汇报经营状况，方寸信纸之间，维系着庞大商业体系的运转。更多时候，家书是亲情与祖训的融合。长辈写给在外子弟的信件，少有严厉斥责，多是温柔叮咛；在外谋生的子弟，也在家信中诉说思乡之情。琐碎的日常问候，成为分隔两地亲人唯一的联结。

在交通闭塞的年代，一封家书从湖南寄往山西榆次，往往需要两三个月时间，等待回信的漫长岁月，成为晋商异乡生活最煎熬的时光。他们守着商号，守着庞大的生意版图，唯一的期盼，就是驿站传来一封来自故土的信件。商业上他们运筹帷幄，掌

较发达的地区，如关内道的西北部、河东道 的北部，以及安西、北庭都护府管辖地区，制毡业都很发达。在毡的制造方面，凉州和太原府的毛毡，是驰名全国的。

二是太原特殊的军事地位。唐代的太原，不仅是北方的军事重镇，也是河东屏障，是防御北方游牧势力的前沿阵地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在太原府城内，驻扎着一支名为“天兵军”的绝对主力。这支部队是唐朝北方最精锐的重装兵团，兵力高达3万人，战马5500匹。庞大的驻军催生了巨大的后勤需求，数万大军驻扎，对毡毯、军粮、被服的需求是天文数字，这种国家级的订单直接滋养了当地的官营手工业。

三是太原特殊的政治地位。太原是唐朝起兴之地，武周长寿元年(692)、唐开元十一年(723)太原两度被设立为王朝北都，成为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全国第三大都会。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太原成为一座工商业极其繁荣的超级都会，不但形成了冶金、酿造、纺织等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，商业网络更是四通八达，是连接长安、洛阳与北方边境的重要枢纽。史书记载，当时的交通要道上“夹路列店肆待客”，南北北往的商旅络绎不绝，商业氛围十分浓厚。太原北都的身份还促进了佛教的兴盛。李渊称帝后，下令在太原、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荆 州等地各建一所“太原寺”，这不仅是一个地名，更是一种政治符号，意味着太原的佛教寺院享有“护国”待遇，这也使得太原寺院拥有远超普通寺庙的经济实力，众多寺院对精美地毯的需求也推动了当地制毡业的发展。

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，白居易的《红线毯》几乎是研究唐代丝绒毯的唯一史料，“彩丝茸草香拂拂，线软花虚不胜数。美人踏上歌舞来，罗袜绣鞋随步没”几句已十分明确地指明，丝毯有剪断后的丝头呈茸草之状，并能使罗袜绣鞋没于丝头之中，显然，此毯乃是一种栽绒丝毯。栽绒丝毯的织造工艺，应是 从西北栽绒毛毯的技术移植而得。“线厚丝多”和“一丈千两”都说明此毯的丝绒高度很高，甚是费料。史料证实，唐代已出现栽绒织法。太原毯之所以“涩”和“硬”，很可能是因为采用了这种高密度、长绒毛的栽绒工艺，这种结构极其实用耐磨，专为高寒地区设计，与宣州用来观赏踩踏的丝毯定位完全不同。白居易拿太原毯做“绿叶”来反衬红线毯，前提是太原毯本身必须是家喻户晓的硬通货，否则这个对比就失去了意义。“太原毯涩毳缕硬”虽然字面是在吐槽太原毯手感粗糙，但这恰恰成了唐代太原毛纺织业极其发达的铁证，侧面印证了太原毯在当时是与“宣州丝毯”“蜀都锦褥”并列的顶级品牌。太原毯靠着扎实的做工成为北方地毯的代表，是北方军民生活和贸易的重要物资。

白居易是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旗手、新乐府运动的领袖，主张文学就是要干预社会、反映现实，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，使他成为中唐诗歌的中流砥柱。白居易把“太原毯”写进了文学史，也把它写进了手工业史。

最后说一句：白居易，祖籍太原。



晋阳手工业（9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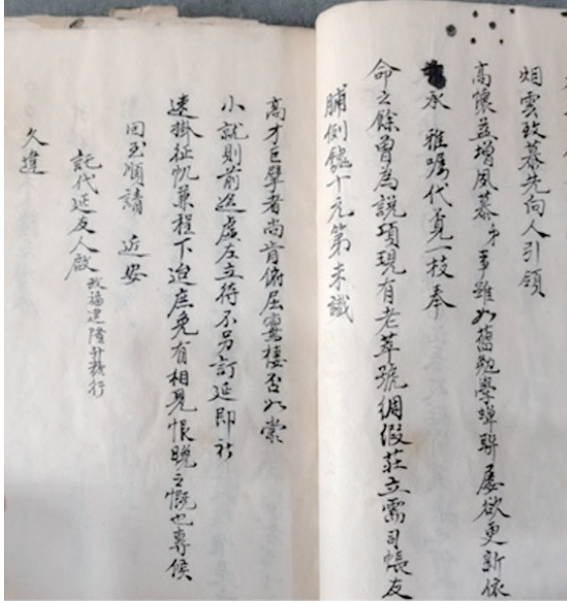
控全局，在家书面前，他们只是思念家人的游子。

在湖南临湘羊楼司一带，留存着榆次晋商张稷家族百余封完整家书，成为万里茶路上晋商家书最珍贵的实物见证，记录下山西商人客居湖南半个多世纪的岁月。清代同治年间，榆次晋商张稷远赴湖南临湘经营砖茶生意，加入当地天顺长商号。羊楼司盛产青砖茶，是万里茶道南方核心产地，茶叶经此地运往汉口、北上蒙古乃至俄罗斯，商机无限，却也意味着长久离别。

张稷扎根湖南之后，子孙后代接续经营茶业，张氏一族数代人常年客居湘地，与山西榆次老家相隔千里。从清末到民国，再到近代，榆次老家与湖南临湘之间的书信往来从未中断，积攒下一百余封泛黄褶皱的信件。这些家书纸张斑驳，有的被水渍浸染，有的边角磨损，毛笔字迹深浅不一，却完整保留了湘晋两地跨越时空的亲情。

信中内容细致入微，湖南这边的亲人诉说南方气候潮湿、茶叶经营的起伏、异乡生活的不易，询问山西老家长辈安康；榆次故土的家人告知家乡收成、家族琐事、宗祠事宜，叮嘱湘地子弟勤俭自持、恪守晋商信义。遇到时局动荡，湘地战乱不断，家书便成为紧急的消息通道，一方告知安危，一方叮嘱避险。张稷终老湖南，未能重回山西故土，他写给老家的最后几封信，满是叶落不能归根的遗憾，期盼后代有朝一日能重回榆次故里。

百余封家书跨越悠长岁月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商业豪言，只有柴米油盐的牵挂、商路奔波的辛苦。票号可以打通全国金融脉路，货物可以走遍大江南北，唯有这份亲情，依靠一纸书信，穿越千山万水不曾中断。这百余封湘晋家书，既是晋商万里经商的缩影，也是中华亲情文化最动人的篇章。



湖南临湘羊楼司留存的榆次晋商张稷家族家书（部分）（作者供图）

傅山先生流传于世 的诸多诗文、书画墨宝，都与祁县渊源深厚。究其根源，皆因祁县有一位与他终身相知、患难与共的挚友——戴廷弼。

傅山年长戴廷弼11岁，二人年少时一同求学于太原三立书院。彼时的三立书院荟萃三晋英才，是全省文脉汇聚之地。自阳曲赴学的傅山才情卓绝，早已声名远播；戴廷弼出身祁县名门望族，书香传世、气度儒雅，亦是小有名气。二人朝夕相伴，同研经史、互论诗文，志趣相投、心性相契，一段跨越一生的知己情谊，自此缘起。

明崇祯年间，傅、戴二人的恩师袁继成因刚正耿直、直言敢谏，遭朝中权贵诬陷，含冤下狱。危难之际，傅山挺身而出，率众奔走为师鸣冤；戴廷弼则倾力出资相助，多方斡旋解围。少年同窗患难与共的经历，让二人的情谊愈发坚不可摧。

傅山一生多次驻足祁县，流连戴府，频频留下传世笔墨，首先源于戴廷弼卓绝过人的才学。戴廷弼学识渊博，为清顺治丁酉科举人，授曲沃县教谕。康熙年间编修《祁县志》，在祁县一众进士、举人之中，官方独荐戴廷弼主笔，足见其学识文品，为当时士林所高度推崇。

其次，源于戴氏望族深厚的家学底蕴。戴廷弼祖父戴光启为明隆庆五年（1571）辛未科进士，初授会宁知县，历任礼科、刑科、兵部都给事中，后任河南右布政使，执掌一省政务。其父戴运昌，为明崇祯丁丑科进士，初任河南尉氏知县，调任良乡知县，后入京任职户部福建司员外郎。明清两代，戴氏一族在祁县古城南街宅邸连片、商铺林立，是祁县声名显赫的书香官宦望族。深厚的家风积淀、优越的家世格局，为傅山、戴廷弼的诗文酬唱、志士交游，筑牢了坚实的根基。

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戴廷弼因一梦，在祁县南街戴家府邸中筑楼建阁，取名丹枫阁。“丹”“枫”皆为赤色，暗寄缅怀朱明、坚守气节的赤诚本心。阁楼落成，戴廷弼专程礼请挚友傅山亲笔题写“丹枫阁”楼匾。戴廷弼字枫仲，于是傅山在匾额两侧行书注解中嵌入其字：“丹，读书之心，字仲以枫；枫，读书之痛、家国之思、守节之诚。这套稀世墨宝由祁县戴氏后人世代珍藏，成为祁县文脉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璀璨瑰宝。

昔日，傅山常年往返于太原与祁县之间。丹枫阁不仅承载着诗文风雅，更凝聚着一代志士的傲骨初心。傅山、顾炎武、阎尔梅等一众文坛先贤、爱国遗民曾齐聚于此，纵论天下兴衰，抒发家国襟怀，著文立说、传承正气，让祁县丹枫阁成为北方大地的文脉高地、气节丰碑。

祁县母亲河——昌源河紧绕丹枫阁蜿蜒流淌，河水自南向北汤汤奔涌。见此山水灵秀，傅山欣然落笔，写下传世诗作《昌源春水》：

昌源乍子临春水，
镜里云梢照影劳。
若得才人似长吉，
不妨听取写离骚。

傅山曾为戴廷弼之父戴运昌亲笔撰写《明户部员外止庵戴先生传》。文中记载：“或早上岩墙固望，望见有虎侵牛犊，即是呼犭下人，群逐之，夺犊归也。”戴运昌晚年隐居祁县麓台山宋家庄，筑有山居别业。傅山与戴廷弼曾多次寓居于此，听闻并记录下戴运昌山居护民、勇救猛虎的乡野轶事。

在此期间，二人同游麓台山麓台古寺，览“麓台龙洞”胜景。戴廷弼撰文《重修麓台庙碑记》，傅山则即兴赋诗咏怀，留下《麓台龙洞》一诗：

麓台洞口树冥冥，
老括长松响不停。
龙去深林风雨黑，
龙归雨歇满山青。

两首诗篇，山水成文，后尽数收录于康熙版《祁县志》，足见戴廷弼对傅山诗文人品的由衷敬重与珍视。

丹枫阁毁于何年？现已无从详考。据2007年版《寿阳碑碣》记载：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，傅山仰慕者、寿阳学者刘震专程寻访丹枫阁，彼时“阁上卷轴断烂，藏品多已不存”。虽楼阁尚在，然阁中珍藏的大量书画卷轴、文籍藏品已然残破散佚。为保全文脉、留住墨宝，刘震将残存最珍贵的《丹枫阁记》及傅山跋文、阁匾题字逐一摹拓，返回寿阳后勒石立碑，置于东关义学，使傅山与戴廷弼的笔墨风骨、丹枫文脉得以跨越岁月、永续流传。

傅山与祁县，不只是过客与访客，更是深耕祁县文脉、点亮昭馥文光的一代宗师。百年风雨，阁楼虽逝，但笔墨不朽；山河更迭，故人远去，但气节长存。